

# 歌妓与唐宋词

袁继灵

(西安交通大学阳光中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在文学发展史上,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 它的产生和繁荣, 歌妓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说, 没有歌妓的参与, 词就难以产生和发展, 也更难以兴盛。在词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唐宋词的基本内容和实用功能的实现等方面, 歌妓都发挥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关键词】** 歌妓 唐宋词 作用 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824(2001)04-0024-03

## Geish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YUAN Ji-ling

(the Affiliated Yangguang Middle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27000,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Ci was once a kind of new literature style, while geisha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course of Ci's coming into being and prosperity. To some extent, without geishas, Chinese Ci would have had no chance to originate and develop, let alone boom.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geishas were always active and their achievements were indelible. For Ci's development, they made arduous efforts and paid a price. Therefore, we should attribu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not only to those writers, but also to those special women - geishas.

**【Key words】** geisha; Ci; 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出,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起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与文学自身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词作为当时一种新兴的文体, 自然也是如此。但是仅仅看到这些恐怕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 歌妓对词的产生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其它文体无需考虑的因素)。从某种角度说, 没有歌妓的参与, 词就难以兴起和发展, 也更难以兴盛。因此,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音节抑扬、情感丰富、形象优美的词章时, 不应忘记为词做出贡献的歌妓。

### 一、歌妓在词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歌妓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奢侈的装饰品和玩乐工具。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 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前者指当时的封建商业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 为歌妓的产生提供一定社会基础; 后者指外来音乐的影响。隋唐以来社会上流行一种新兴音乐——燕乐。“燕乐”不同于诗经时代的“雅乐”和汉魏六朝时的“清乐”, 它是以西域的龟兹乐为主, 然后与我国旧有的民间音乐结合而产生。其特点是: 曲调旋律富于变化, 热烈活泼, 优美动听, 深受隋唐以来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唐诗中的一些绝句就是可以入乐演唱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就证明这一点。但新的长短形式的曲子词所拥有的繁声促节比唐诗的演唱更为动听, 更为流行, 促使以歌唱为特殊职业的歌妓在唐代空前地增多。宜春院、教坊、乐营、北里和平康诸坊都是歌妓积聚之处。宋代是

词的全盛时期,词属于音乐文学,它必须通过歌唱才能充分为人们所欣赏,才能广泛传播,歌妓便是从事这种特殊职业的群体。词的演唱作为一种通俗文艺,它不仅为封建贵族、士大夫所喜爱,也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北宋时的汴京“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可见词与歌妓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它们互为依存条件。没有歌妓,词就失去了它流向社会得以兴盛的媒介,也自然失去了它的音乐文学的意义。

但是歌妓在词体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仅仅起到了被动的演唱作用,事实上,对词或曲的加工改造以及词曲的合成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词史上最初的“选词以配乐”以及后来的“由乐以定辞”,即“倚声填词”,都是指当时的歌妓、乐工将一些本为徒诗的作品,运用当时流行的燕乐乐曲相配,并加以歌唱。由王维的《渭城曲》改编的《阳关三叠》,不仅语言由整齐的七言变成了长短句,其乐曲也明显带有琵琶乐的特点。

词有许多调子,每调有一个名称,即后来的“词牌”,如[菩萨蛮],[念奴娇]等。由于配合不同的乐曲歌唱,当整齐的句式不能很好地配乐演唱时,就不免增减诗的字句来合乐以满足歌妓演唱的需要。象[浪淘沙],[雨霖铃],[抛球乐]等曲词原来都是七言绝句体,后来却演变成了长短句的词调。可见,在词体形成之初,歌妓便显示了其富有创造意义的改造词句的作用。这种创造既是诗人创作优秀诗歌作品的基础,也是对以往歌妓歌诗传统的继承。同时歌妓这种活动也满足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需要,适应了他们的要求。因此歌妓“取当时名士之句入歌曲”的艺术活动便有了广泛的市场。如“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者名籍中”;欧阳修“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文忠(欧阳修)歌词尽记之”;秦观的词为“长沙一义妓所酷爱”;“中吴车氏,号秀卿,乐部中之翘楚者,歌美成(周邦彦)曲得其音旨”。歌妓们之所以爱唱某些词人的作品,是因为那些词以真正的同情表现了她们精神痛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由乐以定辞”这个重要的环节上,歌妓的作用就是通过歌唱,对词人探索并坚持“由乐以定体”的创作准则,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首先,歌妓对词体“乐”的规范作用。词是“由乐以定体”,“乐”之地位,便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歌妓是在一定时空范围中进行的,因此对词调的长度便有所限制。从唐五代及北宋初期词史看,词人所依之词调在篇幅上都以短小见长。

其次,歌妓对词体的语言形式的规范作用。词人只有首先把握住词体的音乐特性,才能审音用字,创造出完美的语言。词在语言形式上崇尚婉媚。因此,唐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人,大都以爱情题材的软语艳曲填词,只有这样才能适合歌妓的演唱。柳咏是北宋第一个填词作家。他早年热衷功名,冶游狎邪,熟悉很多歌妓并替她们填词作曲。在此,他充分考虑到歌妓演唱需要,对词的语言和用乐加以改造以求协合。所以赵师岷在《圣求词序》说:“诗词各一家,艳体(就作品内容而言)虽乐府柔丽之语,亦必工致。”这说明歌妓的唱词对词人在语言形式上的创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歌妓对词体风格的规范作用。词的各种实用功能的实现最终是要通过歌妓的唱词来完成的。因此,词人在创作中,就必须综合考虑以歌妓为中心的各种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宋中期词人王炎在《双溪诗余自序》中承认当时词的创作“字字言闺阁事”且词体“惟婉转妩媚为善”,因而反对豪气词。宋代词学家张炎总结宋人作词经验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看来词人们深知词体与诗体有体性的区别:词婉于诗,以艳丽为特色,以表现儿女之情见长。

总之,词体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歌妓都发挥了一定的规范作用。这些规范作用,对词体的形成,其意义是积极的。

## 二、从唐宋词的基本内容来看歌妓和词的关系

当代词学家们在考察唐宋词的基本内容之后往往颇为赞同“词为艳科”的观点。胡云翼先生说“宋词描写对象,不过是‘别愁’,‘闺情’,‘恋爱’的几个方面而已……这更证明词是艳科。虽有苏轼、辛弃疾等打破词为艳科之目,起而为豪放词,但当时舆论均说是别派,非是正宗。”由此证明,“词为艳科”是基本符合唐宋词的主流情况的。“以艳为美”的审美心理驱使词人把审美兴趣转移到对女性生活和两性关系上。

所谓“艳”,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品题材内容方面,词人们非但不忌讳“艳事”,“艳情”,而且反以此为津津乐道和乐而不疲的咏叹内容;二是在作品的色泽方面,又努力追求一种与其题材内容相协调的香艳味。关于这点欧阳炯在《花间集》的序文里,就曾说最初的词是男女之间“递叶叶之花笺,文袖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可以想象,《花间集》里词“是当时的诗人文士写了歌词,在歌筵酒席之间交给美丽的歌妓去演唱的歌词。”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要求词应当协音律,有情致,把诗词的疆界分开。正如明代词学家王世贞说:“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可以看出,他对词的体性认识非常清楚。五代末年词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六里说:“晋相和凝……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和凝的词今存数十首,如《临江曲》的“肌骨匀细红玉软,脸波微送春心。娇羞不肯入鸳衾,兰膏光里两情深”;和《江城子》的“近得朗来入秀帷,语相思,连理枝,鬓乱钗垂,梳堕印山眉。”这两词是男女爱爱的,在字面上较为含蓄雅致。可见艳词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即两性的恋情与性欲。此外,唐宋词中还保存了许多歌妓优

美动人形象的。如柳咏笔下的秀香: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昼夜乐》)

美丽风流,歌声娇软的秀香,天真地爱在人前夸耀自己的歌喉,而她也确实达到了歌唱的绝诣,博得柳七的赞许。再看小晏笔下的歌妓“小莲风韵出瑶池,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销舞袖垂”;“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吟罢归来酒未消”(《鹧鸪天》);小杏春声学浪仙,疏梅清唱替哀弦,似花如雪绕琼筵”(《浣溪沙》)。

词人之所以在作品题材内容上追求“艳事”,“艳情”和与之相协调的香艳味,探本溯源就均出于词人(主要是指男性词人)对于男女性爱和异性(主要指女性)之美的莫大兴趣和无比艳羡。因为词实属消遣文学,服从于商业利益的目的,具有娱乐性质。又因为接受群众基本是男性,于是娇美的歌妓,艳科的内容,语娇声颤,字真韵正的演唱,便最能满足男性的审美需要。至此理解王安石词中《谒金门》“红笺寄与添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是恨了”之句,就会不足为怪了。王安石这位刚毅执拗的政治家,竟用这样的“柔丽之语”,竟有这样的“艳体”,令人不敢相信,但却又是事实。

所以,从唐宋词的基本内容上看,“以艳为美”的审美心理,既驱使着词人把审美兴趣转移到对女性生活和两性生活的关注上,又在词中努力营造那种以女性之美为内容的香艳氛围,这就给读者(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主体)以及男性词人自身创造和提供了来自别一世界“女性世界”的全新审美感受。因此,歌妓和词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词的内容失去了歌妓,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 三、从唐宋词的实用功能的实现来看歌妓和词的关系

词具有丰富的文化功能。它的实现除了依赖词的创作主体外,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参与——歌妓。

#### 1. 歌妓与词的侑觞劝酒功能

词的实用功能首先表现为侑觞劝酒功能。唐宋以来,封建贵族及士大夫家养着许多擅长歌舞的美女,她们既非妾而又非一般的奴婢,被称为“家妓”(歌妓的一种)。东晋以来士族豪侈,纵情声色,蓄养家妓之风遂盛。石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宋代贵族及士大夫官余之时往往让家妓歌词侑觞,这成为具有时代风气的主要娱乐,因而宋代家妓之盛足可与唐代相侔或者甚之。宋代一般贵族士大夫家蓄妓之风极其普遍,如高怀德“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sup>[1]</sup>,欧阳修家有妙龄歌妓“八九妹”<sup>[2]</sup>,“生平不耽女色”的苏轼“亦与妓游”<sup>[3]</sup>。可见歌妓制度的存在对文人、士大夫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无论是宫廷宴饮,官府会朋,还是文人相携,离亭相送,几乎都有歌妓选词吟唱,侍宴作觞。如北宋词人晏殊,平生久处富贵“雅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大批文士每有宴饮必有“歌乐相佐”,并“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他的词就产生在这样的氛围中。从中我们可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以及和文人一起饮宴创作的情况,还可知词是供歌女演唱的。

#### 2. 歌妓与词的娱宾遣兴作用

随着词的兴盛,词成为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种文化因子。对文人、士大夫而言,无论是家居生活,还是官僚生涯,他们经常借助词这一音乐艺术的力量,使人、使自己的生活走向雅化,走向诗化。陈世修《阳春集序》云:“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远藻思为乐府词,俾歌之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欧阳修的《减字木兰花》所描述的:

歌檀敛袂,缭绕雕梁暗尘起。柔润清圆,百明珠一线穿。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座迷魂酒半醺。

传统的词的创作大都是在这种花间樽前,歌筵舞席上为遣兴娱宾写成的。一些豪情词人还能即席挥毫付诸歌妓演唱。词人晏几道曾忆说:“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四位歌妓)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sup>[4]</sup>。文人士大夫以作词、唱词为迎客的一种方式,并以此来实现词的娱宾遣兴功能,这同样离不开歌妓的参与。词的娱宾遣兴功能的实现,使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趋向雅化和诗化,体现了他们志趣高洁、远离尘俗的个性特征。

词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诗乐结合的音乐文艺,它的兴起与发展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实用功能的实现是通过歌妓演唱实现的。

综述词的产生、发展,词的内容、词的实用功能的实现,我们可以看出,词和歌妓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由于她们的演唱,词的思想情感和内在的艺术美才可能真正地展现出来,新的词章才能广泛而迅速地在社会上流传,并为广大人们所喜爱、所欣赏;由于她们需要不断地演唱新的歌词,而常于侑觞之时向词人索求新词,促使词人为她们创作,这样大大推动了词的发展;由于她们与词人的天然的亲密的关系,词人在与她们的交往中激发了才思,唤起了热情,招来了灵感,这也促使词人写出大量的表现爱情的艺术精美的词章。歌妓曾为词的发展做过艰苦的努力,付出过极大的代价,因此唐宋词的发展兴盛不应仅仅归功于唐宋词人,还归功于那些“弹泪惜新词”的特殊的女性——歌妓。

(下转第38页)

(公元 1037—1101 年)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两首诗的意境相似之点和不同之处同样感动读者。尽管李白、苏轼生活的时代和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了,但这些几百年乃至一千年前的诗在今天人们的心中仍然能够引发强烈的感情共鸣。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映越强烈,艺术越优秀。李政道先生还说:“科学(天文、地理、生化……)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抽象的叙述越简单,推测的结论越准确,应用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科学家和艺术家所追求的方向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与科学的融合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教授也提出:“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李政道与吴冠中两位先生阐明论述,都揭示艺术与科学是人类创造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论是揭示宇宙物质的奥秘,还是揭示情感深层奥秘,其揭秘工作与揭秘者的艰辛可想而知,二者程序相当。艺术与科学之道,均为寂寞之道,一般荆棘颇多,鲜花甚少。它们需要宗教般的情怀和精神,需要狂迷的心态和智慧。艺术与科学工作一向是耐得了寂寞和辛苦的神圣信仰的行为。

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作品在展厅中,典雅稳重,既神秘又富于哲理性。利用新材料、新观念,让观者在艺术与科学的世界中去无限遐想。它不仅是一次主题鲜明、立意新颖、视觉独特的大型艺术活动,亦是一次反映着新时代思想和艺术教育方法之发展的学术活动。变化的历史印迹,将以自己的开放性、超越性、综合性和时代性为特征,对美术的发展进程展现其深刻的文化影响。艺术家也不只偏爱色彩、形态这些纯物质的语言,而会探索由各种信息、各种方式,甚至是抽象的、软的组织而创造出来的更有想象力、更健康、更合理、更高雅的生存方式、生存空间。

在美术馆门前的左右两侧,有两件雕塑艺术品,一件是李政道先生创意:表现物质结构微观世界的雕塑——《物之道》;另一件是吴冠中教授创意:表现生命结构微观世界的雕塑——《生之欲》。这两件雕塑艺术品反映了科学与艺术领域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负电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揭示物质存在的情景;另一个是蛋白基因结构揭示生命存在的图景。这两个领域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宇宙奥秘的最高境界。人类通过智慧的积淀和已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探索和揭示宇宙之理和人类生存的诗意境界。

通过智慧与实践产生了两件雕塑作品。两件作品更能鲜明地、准确地透彻大展的主题与立意,让我们对他们经典论著,不仅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他们诗意的睿智浪漫的情怀产生了由衷敬仰。他们对事物本质的洞察的精微,对艺术形态和形式内涵的敏锐,以及他们对物质存在的哲学境界的体悟,都令人叹为观止。吴冠中教授的生命雕塑创意,来源于他深厚的人文修养和对美的事物本质进行抽象概括的敏锐直觉,特别是他充沛的情感所体现出的激情。在诗意存在的境域中,一切存在的高级状态又都具有艺术特征。科学家作为创造者也具有艺术家的诗意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表现宇宙真实存在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则是表现情感世界真实存在的科学家,因为他们按照美的科学规律探索和创造着世界。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存在状态是一种高级行为方式。

现实世界不仅是具象的,而且又是抽象的,抽象形态和形式体现的诗境,正是科学的内在本质。因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我们非常赞同“美是科学的,科学也必然是美的。”或着说美体现了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必然是美的论断,艺术与科学创造的进步所提升的每一个境界,都是无法脱离人类文明进程中情感和智慧的积淀。

两个雕塑两类学科的领域,两种艺术表现的语言和形式,《物之道》与《生之欲》相比,前者更倾向于理性,似格律诗;后者更情感化,似散文诗。两个作品的创意选择显示了两位大师的创造生活和探索两个世界的终极境界。但两件作品创意的诗意境界的终极目标,都指向人类生存和存在的境域——真理的诗意化。

诚言,艺术与科学必须相互渗透、互相融合,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将在新的人类文明的时代创造出新的文化类型,将产生新的艺术形态和新的审美境界。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将使我们进入新的生存和存在的诗意境界。

(上接第 26 页)

注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王灼:《词话丛编》(第一册)《碧鸡漫志》[M].中华书局出版,1986.

洪迈:《夷坚乙志》[M].中华书局出版,1981.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上卷)[M].中华书局出版,1981.

洪迈:《夷坚志补》[M].中华书局出版,1981.

张炎:《山中白云词》[M].中华书局出版,1983.

王灼:《词话丛编》(第一册)《词源》[M].中华书局出版,1986.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王灼:《词话丛编》(第一册)《艺苑卮言》[M].中华书局出版,1986.

10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八[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五[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卷十二[M].中华书局出版,1981.

13 柏寒:《二晏词选前言》[M].齐鲁书社出版,1985.